

方书林之旅



東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方 鸣

装帧设计：王红卫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城市季风：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

杨东平著．—北京：东方出版社，1994.10

(满江红书系)

ISBN 7-5060-0505-0

I. 城

II. 杨

III. ①文化—研究—北京②文化—研究—上海

③地区文化—对比研究—中国

IV. G 122

城市季风：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

CHENGSHI JIFENG: BEIJING HE

SHANGHAI DE WENHUA JINGSHEN

杨东平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北京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4年10月第1版 1995年4月北京第3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17.875

字数：460千字 印数：11,001—26,000册

ISBN7-5060-0505-0/G·88 定价：17.90元

我不知道风
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徐志摩

DI 63 / 27

北京和上海是中国最大、最重要的两个都市。自十九世纪以来，以北京、上海为中心的南北冲突、对峙和交流，构成了近现代史绚丽多彩、激动人心的一页。

上海从一个“小混血儿”奇迹般地出落为享誉世界的“东方巴黎”，而后又变为“计划经济的排头兵”、“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八百年古都的北京在传统与现代的激烈交锋中，几番脱胎换骨，演绎着大都市跌宕起伏、慷慨悲壮的特殊命运。

作为工商业文化、市民文化的大本营和知识分子精英文化的中心，上海人和北京人、“海派文化”和“京派文化”泾渭分明。两种文化、两种城市人格的冲突嬗变，同样耐人寻味，发人深省。

世纪末的中国，又在重演着本世纪初由南向北的社会变革。崛起的上海和巨变中的北京同样令人瞩目。城市的季风仍然强劲而莫测……

目 录

引 言:现代中国的双城记	(1)
第一章 城市之风:中国的南与北	(14)
1. 从东西到南北	(14)
2. 中国的古城和古都	(25)
3. 明星城市:“旧长袍的新花边”	(37)
4. 南北冲突的现代涵义	(44)
5. 从上海到北京	(49)
6. 城市的秘密:关于城市的文化理论	(57)
第二章 京派和海派:风格的形成	(69)
1. 海上画派:海派文化的滥觞	(70)
2. 梨园风景:海派京剧	(79)
3. 文学革命与海上文坛	(87)
4. 京样、京味、京派	(98)
5. 京海之争:三十年代的文化公案	(108)
第三章 京派和海派:双峰对峙	(118)
1. 大上海崛起:雄极一时的海派文化	(118)
2. 北平:京派文化的乐土	(135)
3. 上海人:都市新人类	(150)
4. 文人笔下的北平:京味和老北京人	(168)
第四章 新北京:光荣和梦想	(187)
1. “旧城唯上”:五十年代的毁城之争	(188)
2. 气象非凡的全能型城市	(202)
3. 京味的消解	(215)
4. 昔日王府名宅	(226)
5. 古都风貌:仍在继续的争论	(237)

6. 胡同和大院：两种文化	(249)
第五章 革命文化：新的中心	(259)
1. 革命文化和语言文字	(260)
2. 革命文化和文化革命	(270)
3. 风暴的中心：北京在文革中	(279)
4. 连结北京的红线：“上海帮”集结	(290)
5. 市民文化：抗拒和变迁	(300)
第六章 海派的嬗变	(312)
1. “大上海沉没”	(313)
2. 适应与变形	(324)
3. “上海病”	(330)
4. 阁楼里的“中产阶级”	(338)
第七章 上海文化：新海派	(352)
1. “又多又快，不好不坏”	(353)
2. “上影风格”	(361)
3. 海上文坛：呼唤力作	(367)
4. 上海美术：没有特点的特点	(373)
5. 上海人的新闻兴趣	(380)
第八章 新北京和第三代人	(389)
1. 代的诞生：青年文化的兴起	(391)
2. 红卫兵的早期环境：学校和大院	(395)
3. 复制和反叛：关于红卫兵文化	(404)
4. 从知青到青知：七十年代的“地下文化”	(413)
5. 崛起和失落：青年知识分子文化	(429)
第九章 上海人和北京人	(440)
1. 南人和北人	(441)
2. 两地人互看	(446)
3. 公共汽车小社会	(453)
4. 上海人的价值系统	(457)
精明	(458)
实惠	(461)

合理主义	(464)
规矩和礼数	(567)
世俗化	(472)
西化	(476)
5. 干大事的北京人	(482)
政治化	(483)
侃山和幽默	(487)
豪放	(490)
汉子和小生	(494)
6. 变化中的女性	(499)
上海女郎	(499)
北京姑娘	(505)
婚姻和家庭	(508)
女性的强化	(515)
理想的女性	(520)
第十章 三足鼎立:九十年代新格局	(525)
1. 广东文化:世纪末的新北伐	(526)
2. 新京味文化:从小说到生活	(535)
青年文化的交接	(535)
京味小说	(537)
王朔小说	(540)
侃和调侃	(544)
王朔现象	(548)
文化衫	(552)
3. 海派文化的复兴	(554)
后 记	(564)

引言

现代中国的双城记

1953年,美国学者罗兹·墨菲写了一本关于上海近代史的专著《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三十三年之后,1986年,这本书的中译本得以在上海出版,于是又引起一番至今未有国人写的“上海史”的感慨。

当时,上海文化界正在大张旗鼓地进行“文化发展战略”和“海派文化”的讨论,学者们认真地探讨关于“海派”的定义、特征、正负面的影响,写出许多美文。商人们则不失时机地将每一种商品都贴上“海派”的标签。于是,在海派文化、海派小说、海派影视之外,不仅有海派家庭、海派丈夫之类,也有海派住宅、海派家具、海派袜子等等。“重振大上海雄风”成为一时流行的新口号。

这使人想起了三十年代初文坛上那场“京派”与“海派”的著名论战。那一次是由京派发难的,海派文人锋芒毕露,面对“京派大师”的奚落,“小小的回敬了几手”(鲁迅语)。这一次,只是上海人自己在讨论,并没有与之对峙相望的“京派”参与。

北京人正在关心更为重大和宏观的问题。他们沉浸在关于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文化热”中。在各种官方和民间的会议上,他们对中国的经济、政治、改革和文化重建面红耳赤地争论不休;高墙之后和大院之中,无数个拜访、谈判、聚会和家庭沙龙,当代和未来的政治家、思想家、理论家和艺术家在神情严肃地运筹策划或觥筹

交错,交换着最新的小道消息、外国录像和政治笑话。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政治风云、新锐思想和文化灵感,便在这种散漫无形的交流聚集中,不为人知地悄悄诞生了。

中心便是重心,是平衡点,是交汇点。南国水乡的富饶、婉丽,北方草原的粗犷、豪放,西部大漠的苍凉、凄郁,东部沿海的热情、繁华,都各有特色,别张一面,但唯有它们的集中交汇点——北京,才能整个浑然地代表中华民族的个性和文化。

在中国,有哪个城市,哪个地方,能像北京这样把戈壁滩如云马队的强悍与苏杭丝绸鱼米之乡的温情,最悠古的文明与最现代的气氛都凝聚于一身呢?

几千年的文明史,一百多年的近代史,近在眼前的现代史,敏感的当代史,都正在这个京都中冶炼着。^①

大约在公元前三千年,首先产生于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开始了被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称之为“城市革命”的历史。稍后,在埃及、印度河流域以及中国的华北地区都出现了城市。

哲学家说:人类是擅长制造城市的动物,人类所有的伟大文化都是从城市产生的;世界史就是人类的城市时代史。

然而,我们甚至难以准确地定义:城市是什么?

城市是一个自然和地理单元;城市是人类的一种聚居方式;城市是一片经济区域;城市是一种文化空间;城市是一部用石块和钢筋水泥建构的历史;城市是一部打开的书,记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光荣和梦想、期冀和抱负;城市是一种生活方式;城市是一种群体人格;城市是一种氛围,城市是一种特征……城市正像文化一样,是一种很难定义是什么的现实。

人造城市,城市造人,人和城市造就着城市文化。城市盛衰兴亡的历史命运,便构成了社会变迁和文化变迁的宏观轨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近百年来,以北京和上海为中心的南北文化的对峙冲突,城市地位的消长沉浮,城市文化和城市人格的逆转嬗变,成为

^① 柯云路:《夜与昼》上册,第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

中国现代史上激动人心而发人检省的一页。

如果说,城市的出现是人类生存方式的一场革命;那么大城市的崛起,则是一种奇迹。集中了最多的物质财富,人口密集,从事着规模巨大的经济活动、信息交流和人际交往的超级大都市,成为现代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多种革命性变革的中心。正如恩格斯当年评价法国的巴黎:“在这个城市里,欧洲的文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这里汇集了整个欧洲历史的神经纤维,每隔一定的时间,从这里发出震动世界的电击。”^①

北京,正是当代中国这样一个沸腾的中心。

这个中心曾经是在上海。早在半个多世纪之前,它便享有“东方巴黎”的美誉。

墨菲选择上海作为理解现代中国的钥匙,是有理由的:

上海,连同它在近百年来成长发展的格局,一直是现代中国的缩影。就在这个城市,中国第一次接受和吸取了十九世纪欧洲的治外法权、炮舰外交、外国租界和侵略精神的经验教训。就在这个城市,胜于任何其它地方,理性的、重视法规的、科学的、工业发达的、效率高的、扩张正义的西方和因袭传统的、全凭直觉的、人文主义的、以农业为主的、效率低的、闭关自守的中国——两种文明走到一起来了。两者接触的结果和中国的反应,首先在上海开始出现,现代中国就在这里诞生。^②

然而,面对殿宇巍峨的八百年古都,太平洋西岸这个五方杂处、光怪陆离的现代“魔都”、“千面女郎”仍只不过是历史肤浅、出身暧昧的小混血儿。

当北京的先民越太行山东迁,在辽阔的华北大平原北端聚居之时,上海的大部分地区仍浸泡在海水之中。公元938年,这个唐代的幽州成为辽代四个陪都之一的“南京”——北京由此开始了它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550页。

② [美]罗兹·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第5页。

作为封建王朝都城的辉煌历史——时，今上海地区虽已设华亭县，上海市区的土地只是县境东北渔人出没的地区。在北京成为元大都后的第十四年，公元1291年，上海正式设县，为上海建城之始。然而，直到明末清初，上海县城只是仅有10条小巷的“蕞尔小邑”，因其经济繁荣，则有“小苏州”之名——那时的上海人以说苏州话为荣耀。直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上海开埠之前，在城市林立的富饶的长江三角洲，上海仍只是个默默无闻的小弟弟。

1843年11月7日，上海正式开埠，开始了它充满苦难和屈辱、雄心和梦想的历史。江南的名城迅速陨落了。新一轮竞争是在上海与南方的口岸城市之间展开的。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上海的外贸出口便超过了它的对手——中国最早的通商口岸广州。上海将这一荣誉整整保持了120余年。1986年，广东的外贸出口超过了上海，居全国第一。而曾经被称为“小上海”的香港，至少部分地取代了上海曾作为远东最大的金融、贸易、工商业和运输中心的功能。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历史是惊心动魄的。大约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启动的现代化进程终于引发了火山地震。这是由南至北的一次又一次军事征伐和文化推进，是晚清风雨飘摇的最后岁月和帝制崩解之后，长达38年的军阀混战、民族战争和国内战争。正是在革命的南方和保守的北方对抗冲突的混乱格局之中，上海成为与北方相抗衡的崭新的社会中心和文化中心。

这是被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的十分特殊的历史时期：南北征战的硝烟烈火之中，新文化星河灿烂。

在新文化运动的第二个十年，中国的文化中心历史性地转移到了上海。这个自晚清始新兴市民文化的大本营，风云际会，诞生了不同凡响的“海派文化”。这个移民化程度最高的国际大都会，也成为中国知识分子集中程度最高的城市。这里汇聚了中国各种信仰和主义的政党、组织、团体；出版了反映各种学说、理论、思潮和观念的报刊；发展了不同风格、流派的文学、美术、音乐、戏曲；哺育

并向中国贡献了整整一代政治精英、工商业精英、文化精英和艺术精英——直到今天，我们仍生活在他们所缔造的历史之中。

面对龙吟虎啸、群星璀璨的二三十年代海上文坛、画坛、剧坛，我们几乎难以指认海派的“正宗”，而令人不禁感到：海派，难道首先不就是这么一种巨大恢宏的文化气象吗？

时过境迁，风流云散。海派终于成为封存于档案馆和博物馆的一个历史片断，成为专家学者手下众说纷纭的文化概念。

显然，要真正认识中国，仅有钥匙是不够的。这便是“不到长城非好汉”的意味。

与以上海为代表的沿海口岸城市和南方的中心城市的拥挤稠密、繁华喧嚣不同，在中国的北方，我们看到了另一种城市。它们往往具有值得骄傲的悠久历史，不是帝王之都，便是圣人之邦；仅仅几十年前，它们仍保留着气势非凡的城墙和城门——中国的“城市”之谓由此而产生。没有墙的城是不能算城的，只是市或镇；疏落、空旷的建筑和街道布局，围墙多于店肆；低矮灰暗的四合院民居中，间或露出殿宇的红墙黄瓦或寺塔的身影……北京正是中国的古都和古城当之无愧的杰出代表。明清重建的北京城，以其布局宏大、富丽整肃而被专家誉为“地球表面上，人类最伟大的个体工程”。

在千年不变的稳定格局中，在这个天朝大国坐北朝南的统治中心，凝聚着黄河流域发源的古老文明。巨大的官场和众多的学术机构，一代代士大夫和知识分子薪尽火传，使北京成为知识分子精英文化的渊薮。它的现代转换，是在本世纪初帝制崩溃之后。王气黯然的古都，敦厚宽容、和平幽默的民气上升。五四新文化的精神则为萧散悠远的古都韵致注入了新鲜的活力。北京大学以古旧学府之身而施牛津式自由教育，开创博大精深、兼容并蓄、自由民主的文化新风，正可视为五四精神与古都文化完美结合的典范。在一个特定的历史间隙，北平空前绝后地成为一个文化本位的城市。京

派知识分子文化与京味民间民俗文化相得益彰，营造着具有浓厚的人文气息、淳朴温馨、情趣盎然的北平生活——它也已成为存留于一代人心中的正在消逝的梦境。

大城市成为文化中心的关键，是它吸收、聚合知识分子的能力。这有赖于相应的文化生长机制和文化生态环境。在传统社会的政治、行政或宗教中心，它们是围绕政治或宗教权力而产生的；在以经济立国的现代社会，这种文化生态环境是指繁荣的经济生活造就的富足充裕的物质生活条件，发达的文化、教育、新闻、出版事业和先进的文化设施，成熟的文化市场，思想、言论自由的制度保障等等。因而，文化中心往往不是与政治中心相叠、就是与经济中心相叠。前者的典型如北京、罗马、莫斯科、巴格达等；后者的典型是纽约，以及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另一些大城市则集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为一身，它们或者是传统的政治文化中心在工业革命之后发展为工商业中心，如巴黎、伦敦、柏林、开罗；或者是为适应现代国家的发展，将传统的政治文化中心迁移至新兴的工商业中心，如日本的东京。

现代国家城市规划的特征之一，是政治中心与经济、文化中心的疏离，如美国首都华盛顿、加拿大首都渥太华、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巴西首都巴西利亚等。正是在三十年代，中国出现了大城市功能的有序分离：北平作为传统的文化中心，保持着知识分子精英文化的价值和品位，南京成为新的政治中心——它们分别得到近在咫尺的经济中心天津和上海的支持。上海则同时崛起为具有与北平不同的价值和趣味、以工商业文化和市民文化为主的新兴文化中心。

时至今日，我们尚能在少数省份见到这种堪称优化的城市功能组合。在“天府之国”的巴蜀之地，成都作为传统的行政和文化中心，就像北京一样，那里学府林立，名园荟萃，民性柔顺，在大街小巷众多的茶馆里，人们像旗人一样独钟花茶。在工业和经济中心的

山城重庆——它一度也作过战时的政治中心“陪都”——民风爽直，崇尚时髦，他们看不惯成都人的缓慢节奏和讲究虚礼，他们习饮浓烈的沱茶。

北平和上海不同的城市性质、文化机制和生态环境，使两地文化具有不同的价值、功能和趣味。我们通常用“京派”和“京味”这两个不同的语词来描述北京文化的上下两层。京派知识分子精英文化与京味民间民俗文化构成大雅大俗的强烈对比和反差。我们却只有“海派”这样一个词汇指称上海文化。不同社会阶层、职业角色的上海人，生活在由高度社会化和一体化的城市社会造就的大致相仿的生活方式之中，笼罩在由市场和大众趣味导向的市民文化的氛围中——它造成了一种雅俗共赏的高品位的通俗文化。

京派与海派的对峙冲突，于是具有了超越文学的深刻意义和复杂内涵。形容京派的是这样一些语词：贵族的、高雅的、严肃的、传统的、学院派的（士大夫的）、官的；形容海派的是另一些语词：通俗的、大众的、白相的、功利的、商业化的、摩登的、殖民地的，等等。知识分子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通俗文化的冲突，是现代社会最基本的文化矛盾之一。今天，我们也许比以往更清楚地认识在社会现代化——它必然意味着社会生活的世俗化——过程中，市民文化和大众通俗文化不可替代的价值和作用；同时，也更能理解在新文化建设的初期，面对市民文化、通俗文化的冲击、腐蚀和严肃文化在商业社会中的生存危机，五四知识分子忧心忡忡的目光。

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被 1949 年的成功革命均匀地一分为二。在各种意义上，后四十年的风云激荡并不稍逊于前五十年，就社会变迁的剧烈和深刻程度而言，则更甚于前。大时代的律令如此深刻地改变了城市的命运，世纪末回眸，难免令人惊奇不已。

曾经为辛亥革命所中断的北京的历史光荣，又因共产党革命的胜利而重新恢复。没有比北京更能满足民族文化心理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要求，以及千年沉积的文化归属感了。北京被称为“红太

阳升起的地方”，又被称为“伟大的首都”，而上海只能称为“大上海”，却与伟大无缘——这不仅是因为北京成为不断刮起的红色风暴并不平静的中心，而且还因为它确实“大”而无比。继辽代燕京、金中都、元大都和明清北京的四次大规模重建之后，新中国对首都的第五次重建，使它彻底脱胎换骨，成为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技、交通、通讯等各种中心于一身的气象非凡的全能型城市。1988年10月，北京市常住人口突破1000万大关，提前12年实现了规划在本世纪末达到的人口规模，成为继上海之后中国第二个千万人口的特大城市。这个1949年初辖地707平方公里、人口156万的古都，目前辖地16808平方公里，是上海的2.7倍；市区已建成面积360平方公里，是上海的1.5倍。

尽管北京为它稠密的摩天高楼，纵横交错的立交桥和首钢、燕山石化等经济成就骄傲不已，朝圣者们仍然顽冥不化地在胡同陋巷之中艰难地搜寻八百年古都的流风遗韵，凭吊着在我们眼前和身边日新月异地消逝着的最后的古都……

正像城墙和牌楼、茶馆和庙会退出了我们的视野和日常生活，曾经谦逊而多礼、温良恭俭让的老北京人也退隐到历史的背景之中。今天，我们所遇到的北京人，四分之三是建国以后才进入北京的新北京人及其后代。曾经作为老北京城市文化载体的胡同、四合院及其所蕴育出的京味文化，正像在地理空间上一样，退缩到了城市社会的边缘。当代北京的政治风云和文化思潮不再从胡同中升起，以干部和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新北京人——他们主要生活在大院之中，因而，大院和胡同的分立，构成了新北京的两层文化和两种文化——蕴含着巨大的政治和文化能量，登上舞台中心，成为当代北京城市文化和社会生活的真正主角。

1978年以来，中国几乎所有重要的思想、文化、理论都从这里发源，所有新锐的艺术探索和文化创造首先在这里澎湃——从朦胧诗直至摇滚乐。它对应了整整一代人的崛起——他们是五十年代的红领巾、六十年代的红卫兵、七十年代的知识青年。他们中的

佼佼者后来被称为第三代学者、第四代画家、第五代导演等等。他们是共和国的“第三代人”。八十年代，令人瞩目的青年知识分子文化，可以回溯十年，从六十年代末的“红卫兵文化”到七十年代的“知青文化”中，可以找到其潜行的轨迹。这种一代人共同的精神文化历程，正是在首都表现得最为集中和显著。在一批批才华横溢、气势不凡的风云人物稍纵即逝、“各领风骚没几天”之后，是连续的积累和创造。每一朵浪花都粉碎了，波动却传到了岸边。

这是一个古老而年轻、保守而激进、大雅而大俗的城市。从全国各地源源不断吸纳优秀人才的“文化特权”，使北京成为当代中国移民化程度最高和知识分子最为集中的城市。这使得首都保持着旺盛的文化活力和创造力。它不仅是革命文化和体制文化强有力的中心，也是知识分子精英文化的中心。当更为年轻的一代以自由松弛的心态“玩弄”文化时，它庶几也成为青年流行文化的中心。“新京味文化”成为北京文化的创造活力和个性的最新证明。一些城市“新人类”似乎是不经意的挥洒和调侃，撞开了沟通新老“京味文化”的旁门左道，从而使气息奄奄的老京味在青年流行文化的包装中神奇地复活。

森严的体制文化之外，是活泼的民间文化空间。这里聚集了最多的民办科技企业、民间教育、学术和文化机构，以及文化个体户和流浪艺术家。昔日到上海滩去“闯世界”的冒险家，今天正涌向他们的乐园——北京来打天下。

和北京相比，上海的命运更富于戏剧性。尽管上海由雄视太平洋的国际大都市而变为封闭的内陆大国边缘的工业基地，它仍然保持着传统的荣耀。在遥远的西部和北部边陲，从漠河到石河子，到处都可以听到“阿拉上海人”的声音——他们只要凑在一起，就旁若无人地用上海话大声喧哗，引来当地人妒羨交加的复杂目光。上海服装和奶油蛋糕马上普及了他们移居的那些城镇，全国各地偏远边陲出现了许多“小上海”。而大城市中，那些最繁华的地段